

基层减负： 中央通报的“正、负面”

两栋约二十层的米白色高楼对峙而立,中间坐落着一座低矮主楼。入口处,是“锦宾国际酒店”六个白色立体大字。

位于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的这家酒店,前身是一个因奢华浪费而被中央点名的政府项目——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。

2024年11月,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(下称“专项工作机制”)办公室联合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了3起典型问题,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赫然在列。通报显示,2021年7月至2023年12月,金牛区斥资12.16亿元建设了这座占地8.22万平方米的对外交流中心。项目大量使用进口石材拼花、手工羊毛地毯和玻璃幕墙等高档材料。

通报还指出,会议中心的装修成本每

平方米高达5489元,几乎是建设成本的两倍。

为遏制类似形式主义问题,2024年7月底,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(下称“若干规定”)。这是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的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。一年后,全文于2025年8月对外公布。

在文件出台前,中央自2023年底开始通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,截至2025年7月,已累计通报8批29起,其中26起为负面案例。“政绩工程”和“面子工程”占比最多,共11起。

中共中央宣布2019年为“基层减负年”,六年来,这些被通报的案例揭示了基层减负行动的发展、演化,也记录了教训。

“一把手”盲目推进,占比近一半

这座耗资12亿余元的奢华建筑,最初的规划是成都市金牛区委党校的新校区。公开资料显示,“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党校(成都城市社区学院)”项目规划总面积约8.3万平方米。

2021年6月26日举行的开工仪式上,时任金牛区委书记记金城在致辞中描绘了“红色校园”“智慧校园”“美丽校园”的美好愿景。

2024年11月,中央点名批评这一项目。成都市纪委监委迅速成立调查组。2024年12月,已调任成都市高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金城被查。半年后,出席过开工仪式的金牛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何维楷也落马。

经过整改,此处曾经的“形式主义”典型已完成转型。对外交流中心被成都交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金周路分公司收购后,改造为面向公众的商业酒店。

“对这种形象工程,基层干部普遍反感,但面对领导强力推动却无可奈何。”有知情人表示,这类工程不是短期负担,而是贯穿整个项目周期的长期压力。而一旦项目烂尾或被叫停,整改又成为新的基

层负担。

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多地发生。贵州德江县的“德江陶缘”,甘肃天水的有轨电车项目,贵州兴义市侵占耕地挖湖造景,或多或少都有着相似之处。

近期被通报的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尤为典型。2018年,县里不顾当地实际条件,强推占地面积140亩的文旅项目,规划投资16.5亿元,实际已投5.4亿元。如今,资金链断裂,工程烂尾。

据了解,该项目上马时曾遭遇部分县领导反对,时任县委书记邓晓强便以县“四大班子”领导会议代替县委常委会议,率先表态发言,最终让项目规划按照他的意思通过。而该项目幕后老板正是邓晓强和其女下属。2022年7月,邓晓强落马,后因受贿罪、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获刑19年。

像邓晓强这样凭借“一把手”意志盲目推进的政绩工程、面子工程,在中央通报的26起负面典型问题中,占比超四成。

中央通报的案例主要有三类:有的打着“为民谋福祉”的旗号建设所谓民生工程,如2024年1月通报的福建长汀县“挖山造田”项目,次月通报的广西旱改水项目;有的以“城市发展”为名引进文旅、数

字化项目,如辽宁省阜新市花巨资设立农家书屋,广西恭城县文旅项目;还有的借党建、创城之机设展厅、建交流中心,如成都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项目等。

解决“小马拉大车”

相比难以根除的政绩工程等问题,多名乡镇干部表示,文山会海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有所缓解。“这得益于‘解决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’热潮的持续发力。”四川达州市某乡镇党委书记华君(化名)说。

这股减负热潮掀起于2018年底。2019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,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明确提出“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,坚决把文件压减三分之一以上”。

随后,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》,明确2019年为“基层减负年”。各级党委迅速跟进,相继出台文件,对基层减负作出部署。

除了印发通知,中央还建立了新机制。2019年,中央设立专项工作机制,由中央办公厅牵头,8家中央部门参与,办公室设在中央办公厅。将反对形式主义与基层减负工作结合起来,建立中央层面的专项工作机制,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。



尔后,从中央到县,各级都设立了相应的专项工作机制。这一工作机制办公室通常设置在党委办公室。“其组成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会适时调整。”江西某县生态环境局长辛方(化名)介绍,他所在县成员单位共33个,几乎涵盖党委、政府各部门,还包括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协办公室。

辛方回忆,在基层减负方面,2024年8月发生了两件大事:第一件是“两办”正式印发若干规定贯彻落实。该文件共7个部分,包括精简文件、会议、规范借调干部等,设立了21条具体规定,对文件字数、会议时长及次数都作了具体的数量限制。

第二件就是全国乡镇(街道)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工作推进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。会议强调,全面建立乡镇(街道)履职事项清单。

“这是一个新变化。”曾在乡镇任党委书记的辛方解释,过去基层改革强调将职权下放到镇街,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。然而下放时,职权放得过快过多,而资源却未同步下沉,导致乡镇“接不住”,出现了“小马拉大车”难题。

电视电话会后,多地上级机关开始收回下放的职权。经过一系列组合拳式治理,新华社披露,2024年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的一年。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,以省部级党政机关名义举办的节庆、展会、论坛活动数量分别压减46.3%、65.2%、48.3%。

认识不一致

“基层负担现象,既有历史的原因,又有现实的因素;既有体制机制的障碍,也有理解认识不到位的地方。”重庆市某区委政研室一干部作了这样的总结。

该干部在调研中发现,对什么是形式主义认识不一致。

一次座谈会上,一位乡镇书记抱怨,区里要求他们开的会,他们觉得是形式主义。可区领导认为这是通过会议

形式逐级传达自己的意思主张。还有区直单位干部补充说,有时他们被要求参加与本部门关系不大的会议,但不去又不行。这不是“陪会”是什么?但区领导觉得会议主题与该部门职能相关。

“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过程中,上下级对形式主义的概念认识,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晓东也注意到这一问题,“若干规定也没有对形式主义的概念和内涵作出界定。”

胡晓东认为,判断形式主义需要三方视角:上级、基层和受益群众,不能听取单方面意见,而是要综合判断。例如,如果县领导认为某项目很好,但基层和群众都不买账,那这很可能就是形式主义。

华君认为,需要中央和省市应发布更多典型案例,是干部理解形式主义的“活教材”,“既要有负面典型,也要有正面典型引导”。

实际上,在2023年底最早通报的典型案例中,中央主题教育办会同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共通报了5起案例,其中3起为正面典型:上海开展“四减”行动(减证明、减系统、减考核、减挂牌);湖南对全省发文开会情况进行监测,采用红、黄、绿三色实时预警管理;山西推动编制下沉,通过增加人手、提高薪酬等务实措施赋能基层。

但此后,未再通报过正面典型。而地方层面的公开通报较少,多数省份至今未对外公布任何案例。不过,据新华社日前报道,省、市两级已通报近4000起典型问题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年初召开的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曾释放明确信号:聚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若干规定的典型问题,加大核查通报力度。

杜茂林

基层减负 要落在“实”处

□李云峰

基层是服务群众最前沿,是政策落实“最后一公里”,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“主战场”。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顽瘴痼疾,权责不清、考核异化的机制漏洞,政绩观错位、推责卸任的不正之风,都在为基层增加负担,从而影响基层工作落实、疏远干群关系、影响干部积极性、阻碍地方发展。为基层减负增效,才能让干部在新征程中轻装奋进。切实达到减负效果,根治“小马拉大车”,要用好“实”字诀。

要落实到位,为基层减负筑牢保障。近日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,对基层减负作了细致和明确的要求。对标“规定”内容“减负体检”,梳理可精简清单,理清理顺工作职责和工作机制,层层落实基层减负政策,切实把为基层减负当作新征程中干事创业保障工作,将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和形式主义中解脱出来,让基层干部将主要精力放在核心工作上。

要求真务实,瞄准核心指标抓落实。制定任务要真,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核心问题上;工作作风要实,将政绩观和为群众办实事相统一;考核目标要准,将绩效考核侧重到办实事有实绩上来。以“减负”来确保“真干事”“干真事”。

要真抓实干,发挥主观能动谋发展。基层干部不能减了工作量后“躺平”,而是要充分利用“减负”出的时间精力,积极投身到地方高质量发展之中。要深入群众,掌握社情民意,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;要勤学善思,了解发展大势,为产业发展、乡村振兴谋出路;要担当作为,提升能力学识,善作善成出成绩、有实效,以“减负”来“增质”。



中央通报后,原成都市金牛区对外交流中心经整改,已成锦宾国际酒店。



广西恭城县投资5.4亿元建设的“康养项目”最后烂尾,2025年7月14日被中央通报。